



“The Three Li Brothers of Gaomi” and the Formation of Gaomi Poetics

Jiang Yin

Abstract: Gaomi was known for its achievement of literature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height of its literary reputation is attributabl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Gaomi School of Poetry. As it is known, in the Qing dynasty, famous literary families were often leaders in places rich in literary production. In Gaomi, poets from the Liu, Shan, Li and Wang families formed the core of the Gaomi School of Poetry. Among them,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s were the three brothers of the Li family, namely Huaimin, Xiangao and Xianqiao, who were termed “Gaomi San Li” (The Three Li Brothers of Gaomi).

As a long-standing regional school of poetr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Qianlong period to the late Qing, the emerge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Gaomi School of Poetr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the “The Three Li Brothers of Gaomi” and the compilation of *Revised Charts of Poetic Sects with Ranking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Li Xianqiao had an opportunity to associate with Yuan Mei, a well-established literary figure of the time, when Li served as an official in Guangxi province; this helped the School extend its influences from Shandong to the Lingnan area, and eventually to the northern province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aomi School was also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oetic discourse of the three brothers. The Three Li’s in the Qianlong era virtually wrote only poetic criticism and it was rare that by doing so they had become famous, extended their influences far and established their school. This could be explained that their failure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instrumental in evoking their passion and faith in another field of intellectual endeavor: poetics seemed to be their choice amid a situation of no choices. They regarded studying and writing works on poetry their career and even historic mission, which was worthy of devoting their life eff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poetics, the practices of the Three Li’s were a kind of anoma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poetic trends in the Qianlong period, however, there were indeed certain inherent reasons for what was happening; and these were the adolescent complex of rebellion and the patricide complex, as often seen in cultural history. The liberal and inclusive atmosphere enjoyed by the academics in the Qianlong period nourished the soil for the growth and spreading of this rebellious force. By criticizing and having dialogues with various schools of poetry, in the previous period or contemporary, the Gaomi School constructed and developed itself, with its characteristic discourse on poetry.

Keywords: Gaomi San Li (The Three Li Brothers of Gaomi); school of poetry; poetics

Author: Jiang Yin earned his PhD in Literature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in 1988. After that he assumed a position at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was exceptionally promoted to researcher in 1996. In 1997 Dr. Jiang was visiting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Kyoto University; in 2002, visiting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t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He was “Capital Schola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2000, and visiting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Feng Chia University (in Taiwan) in 2008. At present he is doctoral supervisor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ice presid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ociety and vic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Oriental Poetry Society. Dr. Jiang has been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Dali Shifeng; A Study on Dali Poets; A Story about Wang Yuyang;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Poetics;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al Poetics; Poetic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高密三李”與高密詩學的歷史展開

蔣寅



[摘要]高密古稱文獻之邦，高密文學聲譽的高揚應歸結於高密詩派的影響。在清代，文學發達的地區通常都有一些著名的家族引領風氣，高密則是劉氏、單氏、李氏、王氏等家族，這些家族湧現的詩人成爲支撐高密詩派的骨幹。其中，影響最大者是李氏家族中的李懷民、李憲嵩、李憲喬三兄弟，時有“高密三李”之目。他們面對詩壇流行日久、根深蒂固的三大詩派——吳派、浙派、神韻派，深知光憑否定性的批判是絕對不能動搖其地位的，還必須給詩壇樹立一桿新的旗幟，提供一種新的詩歌美學、新的師法典範，纔有可能轉移風氣。於是，受晚唐詩人張爲的《詩人主客圖》啓發，編著了《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一書，用中唐張

籍的“清真雅正”和賈島的“清奇僻苦”之風來矯正時俗的躁妄、矯飾、浮靡、熟俗之弊，並以之教授鄉里後學，一時從者甚衆，遠近響應，形成一個以高密人士爲核心的地域性詩歌流派。之後，又以李憲喬游宦廣西時與袁枚的交往爲契機，實現其由山東向嶺南，最後擴散到北方多個省份的傳播。高密詩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三李”的詩論中。“三李”的著述基本限於詩學，像這樣專攻詩學而不及其他的學人在乾隆時代本就少見，而能開宗立派的就更是罕觀。這不能不歸結於科舉失敗所激發的意氣和信念，詩學成爲他們生命中無從選擇的選擇，不可寄託的寄託，甚至賦予他們以超出其能力的勇氣，而表現出以詩道爲己任的歷史擔當。從地域詩學的角度說，這不能不說是個異數；但若就乾隆詩學的整體趨向而言，卻又有着合乎邏輯的內在動因，那就是文化史上的青春反叛和弑父情結。乾隆朝學術風氣的自由寬鬆給這股叛逆力量的生長和蔓延提供了適宜的土壤。高密詩派的建構過程，同時也是高密詩學觀念確立和發展的歷史進程，它始終是在對前代及當代各派詩學的批判、對話中展開的。從乾隆中葉直到清末，高密詩派承傳百餘年並在較廣大的地域產生影響，這在清代文學史上祇有桐城派可以相提並論。

[關鍵詞]高密三李 詩學 歷史展開

[作者簡介]蔣寅，1988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並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96年破格晉升爲研究員，1997年受聘爲京都大學研究生院中國文學專業客座教授，2002年受聘爲慶北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2005年受聘爲北京師範大學“京師學者”特聘教授，2008年受聘爲逢甲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國際東方詩話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大曆詩風》、《大曆詩人研究》、《王漁洋事蹟徵略》、《中國詩學的思路與實踐》、《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清代詩學史》(第一卷)等。

就地域性流派而言，乾隆以後到嘉道之間還能形成風氣、影響一時的群體也祇有“桐城派”和“高密派”了。自20世紀60年代汪辟疆《論高密詩派》發表以來^①，高密詩派祇因與晚唐詩的承傳有關而偶為治唐宋詩者所留意^②。直到近年，隨着清代文學研究的拓展，更加上高密當地學者的參與，高密詩派的理論與創作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在專題論文之外^③，還出版了李丹平《高密詩派研究》和宮泉久《清代高密派詩學研究》兩種專著^④。前者是今人研究論文資料的彙編，後者是關於高密派詩學的專題研究。憑藉這些論著，高密詩學的基本內容及理論主旨已清晰可見。然而，對於高密詩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尚缺乏完整的描述，本文希望在這方面做一些補充。

一、李氏昆季與高密詩派的崛起

高密古稱文獻之邦，它是晏子（前578—前500）、鄭玄（127—200）的故里。然而自魏晉以降，風雅不競，文學之名不顯。迨乾隆十九年（1754）纂修縣誌，前代作家僅列七人，沒有著名人物；清代收錄十一人，單氏有若魯、父琴、父宰、履豫四人入選，是高密聲望最著的文學家族。高密文學聲譽的高揚，不能不歸結於李氏昆季及高密詩派的影響。在清代，文學發達的地區通常都有一些著名的家族引領風氣，高密是劉氏、單氏、李氏、王氏等家族^⑤，這些家族湧現的詩人成為支撐高密詩派的骨幹。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李氏家族，懷民、憲嵩、憲喬三兄弟，時有“高密三李”之目。高密詩學的成就也主要體現在他們的詩論中。

李氏是高密有數的官宦世家，祖父華國官阜城知縣，父親元直中康熙進士，官至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臺灣，以剛正敢言著聞於時^⑥。懷民兄弟三人：懷民（1738—1793），名憲噩，以字行，號十桐、石桐，以諸生終老^⑦；憲嵩（1739—1782），字叔白，號蓮塘，亦以諸生終；憲喬（1747—1797），字義堂，一字子喬、義堂，號少鶴，乾隆四十一年（1776）舉人，官至廣西歸順州知州^⑧。三李生為名臣之後，少孤而以學行相砥礪，終竟困於場屋，除憲喬因獻詩僥倖蒙召試賜舉人，懷民、憲嵩都偃蹇不遇。懷民憤而棄學業，肆志於詩學，兩弟從而羽翼之，終於以文學名世。懷民著有《易經註》、《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石桐草堂集》、《石桐先生詩鈔》，編有《晉唐六家五言詩選》、《三唐五律詩選》三卷^⑨，又編後學詩為《後四靈集》。憲嵩有《定性齋集》、《蓮塘遺集》刊本行世，尚有詩文集十六卷及考訂筆記若干卷藏於家。憲喬著有《少鶴內集》、《鶴再南飛集》、《龍城集》、《賓山續集》、《拗法譜》、《通轉韻考》，又有《龍川雜記》、《曇阿集》各一卷已繕寫成帙，而《詩經直說》未成書，編有《韓詩讀本》。^⑩他批《昌黎詩集編年箋註》的評語，後曾為程學詢改竄冒名為《韓詩臆說》行世。^⑪“三李”的著述基本限於詩學，像這樣專攻詩學而不及其他的學人在乾隆時代本就少見，而能開宗立派的就更是罕觀。這不能不歸結於科舉失敗所激發的意氣和信念，詩學成為他們生命中無從選擇的選擇，不可寄託的寄託，甚至賦予他們以超出其能力的勇氣，而表現出以詩道為己任的歷史擔當。從地域詩學的角度說，這不能不說是個異數；但若就乾隆詩學的整體趨向而言，卻又有着合乎邏輯的內在動因，那就

① 汪辟疆：“論高密詩派”，《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第2輯。

② 張宏生：“姚賈詩派的界內流變與界外餘響”，《中國詩學考索》（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李建昆：“試論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東海中文學報》17（2005），收入李丹平主編：《高密詩派研究》（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第307—331頁。

③ 趙黎明、朱曉梅：“李憲喬詩歌的意象分析”，《廣西大學學報》6（2002）；石玲：“袁枚與高密派：乾隆時期詩學流派的交融與分野”，《文藝研究》6（2004）；漆福剛：“李憲喬（少鶴）的詩學思想評析”，《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2005）；宮泉久：“高密派詩學所關的一代詩運”，《東方論壇》4（2012）。

④ 李丹平主編：《高密詩派研究》；宮泉久：《清代高密派詩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⑤ 解荀靈：“清代高密單氏家族著述述略”，《清代文學研究輯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第3輯。

⑥ [清]韓夢周：“文學李君墓誌銘”，《理堂文集》（道光三年刊本）卷9。

⑦ 李懷民事蹟見《石桐先生詩鈔》附墓誌銘，《清史列傳》卷72有傳。

⑧ 李憲喬事蹟見《清史列傳》卷72。

⑨ 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藝文志》（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第7冊。

⑩ 李憲喬《韓詩讀本》一卷有嘉慶十八年抄本傳世，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⑪ 郭尚傑：“《韓詩臆說》的真正作者為李憲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3（1995）。

是文化史上的青春期反叛和弑父情結。乾隆朝學術風氣的自由寬鬆給這股叛逆力量的生長和蔓延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我最初在山東師大圖書館讀到李憲喬《偶論四名家詩》稿本，就對它鮮明的批判立場驚訝不已，我還沒見過類似的基本站在否定立場上批評前代詩人的選本。它評論的是本朝四位名家，今僅存朱彝尊、王士禛兩家^①。王恒柱注意到書前李憲喬手書寄韋廬（李秉禮）劄（王文作序）提到“孫顧厓、王若農皆未嘗示之，以竹垞爲若農同縣前輩，而顧厓乃歸愚之門人也”，推知沈德潛也是四家之一；^②這無疑是有道理的。我更推測查慎行可能是剩餘的另一家，李憲喬與袁枚論詩書中曾專論其詩之卑靡，而查慎行恰好與沈德潛並爲康、雍之際詩壇的重鎮。李憲喬劄稱，“此四先生各自成家，固當不廢，唯質之於古，多有見其不然處。某不敢媵媵附和，輒命學生隨錄數首而加討論焉。此冊藏之篋衍，從未嘗出以示人，因韋廬性同心契，致不朽之盛事，薄眼前之喧卑，謹附上請釐定其是非”，因知此冊爲憲喬及門人講論四家詩的記錄，在遊宦粵西期間曾就詩友李秉禮商訂。

所論四家中有王漁洋，毫不奇怪，對王漁洋的重新評價本來就是康熙末到乾隆間論詩的時髦。憲喬作爲山東後學，論詩夙有取於這位鄉賢，議論中終究褒過於貶，負面批評除空洞無真氣的老生常談之外，僅集中於學韋一點。因爲韋應物也是他醉心師法的楷模，王漁洋學韋在他看來終究有點走樣，因而評漁洋《龍潭登舟棲霞僧相送》時順便指出：“意取韋左司之格韻，而自加以粉澤，不知其中已非左司也。左司好處，全在不求好而味之無盡；阮翁極意求好，而味去卻無甚意思。”這都好理解，讓我意外的倒是朱彝尊成爲抨擊的對象。雖然我在以前的論文中曾提到過“南施北王”在乾隆間同遭詩家鄙薄的現象^③，但印象中以朱彝尊之品格醇雅，學術精粹，詩歌雖未達一流境界，卻也很少蒙受嚴厲的批評。趙執信的“朱貪多”已是很不客氣的詆斥，而李憲喬此書則簡直將竹垞批得體無完膚。《偶論四名家詩》的詩作評選，乃是有次序的。《帶經堂集錄》小序云：“阮亭平生宗尚在王韋，故凡學王韋者，乃其本相。但所造深淺，莫可掩耳。至後來漸事馳騁，規取杜陵局陣，不知是非性所近，難相入也。選者乃專以此種，未免強作解事。茲特先錄其詩之學王韋者共參論之。”《曝書亭集錄》小序又云：“人言竹垞長於懷古詩，因先取其懷古諸作論次之。”看來，他先評什麼後評什麼，矛頭都指向世間定論，顯出與詩壇主流評價的尖銳對立。這當然也是一種擒賊先擒王的策略——上焉者如此，下者更不足道，舉一反三，輕鬆地達到全面否定評論對象的目的。《曝書亭集錄》所選朱彝尊詩分五類，計懷古詩15首，學古詩11首，感遇詩10首，讀書詩12首，風情詩8首詞1首。李憲喬的評語全部批在書頭，幾乎沒有好話，都是揭短。對懷古詩的總體評價是“直同稗官衍義，但可供衢市人耳，若以言詩，何足有無”。具體作品如《謁大禹廟二十韻》是“臚陳故實，毫無觀感”，《登滕王閣》“直是作應試排律伎倆，絕不見登臨之興”，《于忠肅公祠》“不過將本事點綴排敘”。其他如學古一類，評《怪鷗行》“絕無感興深刺”，“亦大失性情之正矣”；《短歌行》“都是陳言，何不務去？”感遇一類，評《永嘉除日述懷》僅言“貧窮賤辱，流離羈旅，不能自存”之情，其志“亦太鄙矣”；評《傷歌行》“直是丐者心腸，陶公乞食恐不如是”；評《人日謁景皇陵》“其志本浮而不摯也，不過借作一話頭耳”。讀書一類，評《讀書十二首》其十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老杜所以爲詩聖也；‘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竹垞詩文所以爲書肆也。詩聖者，技也，而進乎道矣；書肆者，賈人之業耳。陋哉，底裏見矣。”又評其三：“此可作應試冊，料不是詩。”風情一類，則徑目爲“輕浮靡濫”，評《閑情八首》其一是“用騷卻成腐，一邊駁朱子辨鄭衛，崇思無邪，一邊卻作此等濫語，正不知是如何安排”；其四“竟純是小說聲吻，罪過

① [清]李憲喬《偶論四名家詩》（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青絲欄箋稿鈔本），封面題“偶論四名家詩屬山人附”，封裏有“庚申春二月吳下後學何錦敬覽數過”題記。內容詳見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390—391頁。後引該書，俱見此本。

② 王恒柱：“從《偶論四名家詩》看清高密詩派對王士禛的評價”，《山東師範大學學報》3（2005）。

③ 蔣寅：“神韻與‘性靈’的消長——康、乾之際詩學觀念嬗變之跡”，《北京大學學報》3（2012）。

罪過”；其五“蓮花細步上蘭階”句，“多少做作，令人難堪，作香奩詩至此，亦苦海矣”。而於《沁園春·隱約蘭胸》一詞更曰：“惡極濫極，笨極醜極，不惟冬郎、飛卿、黃九、秦七集中所無，即同時若尤展成、曹實庵亦不屑道也。結意措詞純是時下淫惡不堪小說派頭。詩餘至此，亦可謂掃地矣。”^①措辭頗為激烈。他對朱彝尊的評價，一言以蔽之，就是“沒個安身立命處”^②。

李憲喬所以如此痛批朱、王，自稱是鑒於“詩自朱、王狎盟以來，吮毫之子多以雕績為工，旖旎相尚，風格浸以頹靡”^③，骨子裏其實也不排除搶奪話語權的動機——通過對上代作家的否定，樹立新的詩學觀念和藝術趣味。為實現這一目標，要打倒的不僅是父輩，還包括已故的兄輩甚至健在的先達。儘管《偶論四名家詩》沈德潛卷已不可見，但其中對沈德潛不會有什麼好話，則是不用懷疑的。李憲喬對沈的態度，其實從評漁洋詩已略可窺見。如《收京》“海內兵塵滿乾坤”句憲喬批：

每見各州郡中有殉難盡節之人，亦必有許多詩句載在郡州縣誌，大概如此二、三、四句也。千手雷同，遂成習套，似乎闡揚節烈，此尚不足恃耳。歸愚每見詩有忠孝節義字，必即亟取之，以為能合乎《三百》止乎義理之旨，亦不問其詩若何也。所以於漁洋亦取此等，矜為特識，哪知正是漁洋短處。

這已明確判定沈德潛論詩無見識，所以門人問王漁洋、沈德潛安身立命處何在，他笑而不答。^④不祇是沈德潛，李憲喬對袁枚也很不滿。在與李秉禮論詩，談到韓愈既具正法眼又能狡獪神通時，他曾提到：“外間不解此語，所以襲乎仁義忠孝之言，而不足以動人者，則有沈歸愚一派；恣乎緣情縱欲之言，而不足以垂教者，則有袁子才一派。此二者，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也。”^⑤《凝寒閣詩話》中於並世詩論家少所許可，有云：“都下談詩者曰紀曉嵐、翁覃（原誤作潭）溪、錢籜石三人而已。然曉嵐博而時俗不可耐，覃溪有志而無實得，亦不能免於俗尚，籜石文尚不如其人。是所謂晨星者不過爾爾，未足一探求也。江南走名者，又有七才子之目。時從予遊者，有南通州錢生、巢縣許生、無錫秦舍人，則皆知鄙之，為不足傳矣，不待北人言也。”^⑥李懷民同樣認為翁方綱“詩文皆欠靜細”，甚至連李憲喬頗稱道的黃景仁詩也覺得“殊不合鄙意”。^⑦無論這些評斷是否允當，它們體現了高密詩派特異於時的詩學立場，是可以肯定的。

如此說來，“三李”要打倒的正是康熙以來的四個主要詩派，即漁洋後學承傳的神韻詩派，朱彝尊、查慎行開創而為厲鶚、錢載所發揚的浙派，從錢謙益到沈德潛一直維持其穩定地位的吳派，以及紀昀、翁方綱所主導的學人詩派。當然，作為自清初以來一直佔主流地位的山東詩學的傳人，他們首先要否定乃至超越的肯定是王漁洋。事實上，正如研究者都注意到的，“三李的許多論詩主張就是直接針對王士禛而發的”，“他們對王漁洋及其追隨者‘蹈空無着’、‘塗飾柔膩’的詩風的扭轉，從主觀動機上是為了回歸風雅的傳統”。^⑧他們不僅全面認同同鄉先輩趙執信對王士禛“詩中無人”的批評，同時也全盤繼承了趙的詩學觀念。李懷民《批眾家詩話》一再斥王漁洋“全好大言駭世”^⑨，批漁洋詩話中“越女與勾踐論劍”一則，說：“阮亭談龍貽譏秋

① 關於《偶論四名家詩》對王士禛、朱彝尊的批評，王恒柱“從《偶論四名家詩》看清高密詩派對王士禛的評價”〔《山東師範大學學報》3（2005）〕、“從《偶論四名家詩》看李憲喬的詩學觀——從其對朱彝尊的評價考察”〔《山東師範大學學報》5（2006）〕兩文有細緻討論，可參看。

② [清]李憲喬：“書韋廬續集後”，《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150頁。原列於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中，據內容考之，當為李憲喬作，後同。

③ [清]李憲喬：“跋”，《韋廬詩集·內集》（嘉慶三年家刊本）。

④ [清]李憲喬：“書韋廬續集後”，《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153頁。

⑤ [清]李憲喬《與李秉禮論詩劄》冊頁，浙江浙商拍賣有限公司2011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57109-285542246.shtml>。

⑥ [清]李憲喬：“凝寒閣詩話”，《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249—250頁。

⑦ [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日記詩話摘錄”，《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93頁。

⑧ 石玲“袁枚與高密派：乾隆時期詩學流派的交融與分野”〔《文藝研究》6（2004）〕、“清代初中期山左詩學思想述略”〔《文學遺產》2（2007）〕兩文對此都有專門討論，可參看。

⑨ [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61頁。

谷。誠若言，使學者蹈空捉摹，豈不誤盡天下！吾故曰漁洋客氣多。”^①而對趙秋谷“始學為詩，期於達意”之類的老生常談，則許為“巨論”；於“唐人詩，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這種似是而非的臆說，則歎為“巨眼”；甚至連趙轉述馮班《古今樂府論》之說，也盲目稱歎：“飴山快論，可為浮三大白！”^②認真掂量他對王漁洋的批評，實在過於苛刻，大體屬於見識有限，祇能欣賞較粗淺平實的議論，至深微之處多不得解悟；有時露才揚己，欲示高明，適足自形庸陋。如王漁洋說：“七言五句，起於杜子美之‘曲江蕭條秋風高’也，昔人謂貴辭明竟（意）盡，愚謂貴矯健，有短兵相接之勢乃佳。”懷民批：“亦須看題行文，難以執煞。”^③其實王說是有見地的，能得體制之要，李懷民偏退回到一般常識去，看似通達，實則無謂。又如王漁洋曾說唐人拗體律詩有兩種，一種是“蒼茫歷落中自成音節”，舉杜甫“城尖徑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篇為例；一種是“單句拗第幾字，則耦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舉趙嘏“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許渾“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為例。李懷民批：“其實‘城尖徑窄’等篇是拗體，若‘溪雲初起’等句實唐人之諧律，不可謂拗，阮翁又未之知也。”^④“溪雲”兩聯第五字互救，固然是唐人常格，但自屬拗救，不能說是諧律。其自以為是處往往如此。要之，李懷民的評價，讓人感覺也像趙執信論王漁洋那樣，帶有濃厚的意氣成分。不難理解，類似趙執信、李氏兄弟這樣或中年廢置、或偃蹇不遇之人，對王漁洋一等成功人士，內心深處難免都會有本能的抵斥，但形於言辭卻往往表現為挽救世道人心的慷慨正論。

在李懷民的詩論中，《書單子受詩後》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⑤，細加玩味有助於明白他們的基本思路。懷民開篇先肯定“通觀諸什結構完成，烹煉純熟”，應該說單詩已有很好的基礎。繼而道“古人至處，有非完好、烹煉所能盡者”，這也不錯。然而接着“故章法不串、押韻不老、屬對不工、選詞不倫、結意不密等弊，皆不足為我子受病”數語，就不免讓人對前面肯定的“結構完成，烹煉純熟”產生懷疑了，難道存在這麼多毛病還不必在意嗎？原來他認為，“此時所急者在骨格，不在品貌；在識見，不在力量”，並且相信“骨格既高，品貌亦清；識見既超，力量必到”。這恐怕已不是誰都能同意的了。再看他如何理解“識見”：

識見者，先識得古人如何居心，如何行徑，譬如韓、孟、張、王，皆孔門狂狷者流。其人皆不合於時，不宜於俗，故發言為詩，冷峭孤直，闢易一切，雖傳之千年，尚足以立頑起懦，所謂表見性情者，此也；詩中有人在者，此也。

顯然，他的識見絕非葉燮（1627—1703）所謂才、膽、識、力之識，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高超見識，而是特指韓愈（768—824）、孟郊（751—814）那樣的特立獨行、矯激不群的處世態度。明乎此，他如何理解“骨格”也就不難預料了，當然是鄰於韓、孟一派的美學趣味：

骨格者，為松桂不為桃柳，為璞玉不為燕石，宜瘦忌肥，宜淡忌濃，宜冷忌熱，宜辣忌甜，寧粗直勿粉飾，寧峭勁勿軟媚，寧為時人所忌，勿為俗人見稱。放翁云：“氣骨真當勉，規模不必同。”孟貞曜云：“今時出古言，在衆反謂訛。”方干云：“所得非衆有，衆人那得知？”有云：“俗人猶愛未為詩。”此可想見昔人骨格矣。

在《與某論詩》中，他將性情也作了個人化的詮釋：“所謂性情者，非必如海陽鞠慕周所謂致中和也，彼但以大腸皮話嚇人耳，非希寔實效者。詩人性情，祇是不合於衆，不宜於俗耳，略似古狂狷一流人。”^⑥這樣，所謂性情、識見、骨格都成了以韓、孟派詩歌風貌為指歸的概念。他不僅以此為詩歌藝術的理想，還極力將其矯激背時的寫作態度標舉為自古以來的詩歌傳統，而這一傳統在唐宋又分為兩派：

①〔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60頁。又，批漁洋說最喜司空圖《詩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亦說：“總是蹈空無著浮論，自誤誤人。”第61頁。

②③⑤⑥〔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68、64、78—79、80頁。

④〔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65頁。按：“溪雲”一聯為許渾《咸陽城東樓》中句，此屬誤記。

一派清空和易，崇尚自然，錢、劉、張、王、元、白以下諸君主之；一派生刻峭勁，力開生面，島、洞、松、鳧、馬戴、裴說以下諸君主之。沿及有宋為西江派，而宛陵之和，大，後山之堅深，大概不離乎此兩派。其崇尚自然者，狂者似之；其力開生面者，狷者似之。高明沈潛，自昔為然。則雖上溯漢魏、六代，下及元明、本朝，凡成家者，舉不能出二者之外。然此兩項人，每不為時人所許。^①

總之，呈現在他們眼中的詩歌傳統，歸結起來就是，“蓋溯自建安、黃初，以迄有唐三百年，凡成家者無不以騷雅為指歸，與世俗為讎仇”。這樣，他們就自然地將自己鑲嵌到一個主觀設定的詩史情境中，“元明以來風雅道喪，復古樂者，非我輩其誰屬乎？”^②人們已在陳子昂、韓愈以來的很多詩人身上看到這種主觀設定及其相應的言說方式，不意到乾隆後期它又在“三李”身上再現。但這很可能是詩歌史上最後一個有影響的復古宣言了，因為葉燮自成一家的主張經袁枚性靈詩學發揮，在乾隆末已形成浩大的聲勢，到嘉、道以後更演漾為絕對的自我表現論，創變成為詩壇一致的口號，儘管各種創變的內容紛紜不一。此時李懷民還沒感受到袁枚性靈詩學的衝擊，還在醞釀着他“共勵頹風，扶持詩教”的復古夢。但他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就像他勉勵單子受，說子受的清才麗句在本朝名家中，就拿尤侗的豐潤、宋琬的香豔、王士禛的風韻、汪琬的才情來比也不甚多讓。可事實果真如此嗎？以上四位，後人稍能具其才學即足以名家，可如今又有誰知道單子受呢？在此人們已能看到李懷民觀念中的一個矛盾：一方面高自位置，期許遠大，顯得抱負不凡；一方面又將身段放得很低，門檻也定得很低。他提醒單子受的當務之急，“識見”不過是“詩中有人”，“骨格”則為與俗立異，而藝術典範更可以預期非中唐莫屬，這嚴格地說都不是保證詩藝上達的充要條件。依據這些原則，可以寫出一種不同於時尚的詩歌，但絕不足以保證寫出一種格高韻勝、自成一家的詩歌。或許他們內心也沒那麼高的希求，也沒那麼足的底氣。李懷民《論袁子才詩》曾順便提到：“吾鄉漁洋先生以詩馳名海內，特興風韻一派。然其流弊，遂成塗飾柔膩，故身後聲名日減。”^③他自己對馳名海內，興起高密一派，恐怕連想都沒想過；後來高密詩派所以能流行於南北，“高密三李”能揚名一時，實在與懷民兄弟同輯《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一書大有關係。

二、《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與高密詩學宗旨的確立

李懷民可以用一句“元明以來風雅道喪”輕鬆地抹殺清朝的詩歌成就，但面對詩壇流行日久、根深蒂固的吳派、浙派、神韻派這三大詩派，他深知光憑否定性的批判是絕對不能動搖其地位的。破的同時還必須立。祇有樹立一桿新的旗幟，給詩壇提供一種新的詩歌美學、一個新的師法典範，纔有可能轉移風氣。在懷民兄弟看來，當時詩壇“襲為渾淪宏闊之貌，飾為高華典冊之詞”、以致“貌為高華，內實鄙陋”的流弊，實與康熙末年以來詩壇日益趨於躁妄、矯飾、浮靡、熟俗的積習有關，矯正之道祇有藥以清真、僻苦之風。乾隆初年，黃子雲在《野鴻詩的》中曾提出：“凡詩有不足之病，即以前人對病之法治之：病在怯弱，療之以陳思；病在蒙晦，療之以記室；病在清臆，療之以光祿；病在陳腐，療之以宣城；病在沾滯，療之以參軍；病在魯鈍，療之以簡文；病在淺率，療之以開府。若此者不可悉數，在學者審擇所處而已。”^④李氏昆季的思路如出一轍，不過他們的具體策略是要用中唐張籍、賈島的清真、僻苦之風來矯正時俗的躁妄、矯飾、浮靡、熟俗之弊。為此，他們編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一書，用以教授鄉里後學，不意一時從者甚眾，遠近響應，竟形成一個以高密人士為核心的地域性詩歌流派。

這是高密詩學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此之前，高密沒有較鮮明的詩學主張。年輩稍長的

① [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與某論詩”，《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80—81頁。

② [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書單子受詩後”，《紫荊書屋詩話》，《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79頁。

③ [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論袁子才詩”，《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104頁。

④ [清]黃子雲：“野鴻詩的”，《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下冊，第852頁。

高密詩人單烺有《答贈任景周》詩云：“近代濟南詩派起邊李，四溟山人羽翼之。名流輩出踵相接，新城季木爲白眉。家法漁洋應運出，高踞壇坫放厥辭。興酣落筆頽唐甚，擢蘭槳兮蔭桂旗。縱橫南北一萬里，上下千年盛於斯。先生自言不及古，此中得失惟心知。顏曹田謝十才子，德水舍人用偏師。秋谷負氣不相下，《談龍》一錄紛紛爲。哲人其萎風流絕，海岱之間復爲誰？我輩尚論具隻眼，讀書莫被古人欺。異流別派先河在，持擇貴自能得師。”詩中雖然對山左詩學的源流做了清晰的梳理，但並未說明自己的詩學主張和師法路徑，祇是在稱讚任氏能得漁洋詩學真傳後，宣稱“他年歸去侍座右，看君兼綜徐劉與左思，更能上探麟經旨，果然古樂非追蠹”。^①這當然是不着邊際的套話。單烺又有《贈待鴻三君》詩，稱“雅工五字本天真，高峙長城莫問津”，“爲問吟髭撚斷否，輸他俊逸劇清新”，被稱讚的對象應該長於五言，且不屑於晚唐的苦吟之風。作者還有一首《學晚唐》，同樣也主中晚唐平易流利之風。不過，這祇能看作是一種詩歌趣味，直到乾隆中葉“三李”脫穎而出，高密纔有了鮮明的詩學主張，同時形成獨樹一幟的詩學流派。

“高密三李”何時在詩壇揚名尚不清楚，但年及而立已爲人所稱，則是可以肯定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前後，濟南周永年致李憲嵩書稱：“三李之名聞於陽扶、汝安、紉庵者非一日。”^②看來，在編成《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乾隆三十九年）之前，“三李”的名聲已傳播在外。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則以懷民、憲喬爲高。汪辟疆認爲，懷民“守律嚴，措意深，卓然中晚張、賈矩矱。少鶴五言，近賈爲多”，“惟五七言古體，則嘗出入韓、蘇，氣體稍大，與石桐專事峭刻者不同”。^③要之，其詩風都淵源於中唐。即從唐代開始，一種詩學的基本品格不再取決於論者標榜什麼樣的審美理想，而在於接受何種詩歌傳統。^④對詩歌傳統的態度及其具體取舍決定了詩人的寫作方式和批評立場。高密詩派的風格淵源及藝術作風便是由其對詩歌傳統的接受視野所限定的。

在高密詩派的成長史上，李懷民兄弟編纂《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無疑是一個有標誌意義的事件。晚唐詩人張爲的《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詩分爲六大門戶，以六主七十八客分梳中晚唐詩流別，是古代文學批評史上很獨特的一部書。今傳本已非原貌，說明文字和詩例都有殘缺，又缺乏可相印證的資料，以致作者意旨難以體度，後人每疑其說而不取。迨宋代方回《瀛奎律髓》取張洎《項斯詩集序》之說，將張籍、朱慶餘等與賈島、姚合等別爲兩派^⑤，明代楊慎又從而發揮之^⑥，遂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中晚唐詩觀。清代較早注意張爲《主客圖》的人可能是紀昀，李文藻《張爲主客圖跋》云：

唐人爲詩，最講聲病，顧其書曰式曰格曰密旨者，皆不傳於世。近吾鄉趙鈴山始以所聞於常熟馮氏者爲之譜，而唐詩聲調概可推矣。若張爲《主客圖》，則當時之摘句圖耳，非可以意揣而得也。吾房師紀春帆先生，依計敏夫《唐詩紀事》所載而排纂之，其八十四人中可考者尚七十有二，蓋幾幾乎爲之原書，與趙《譜》借唐詩以起例者不同。^⑦

文末署日期爲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五月，由此知紀曉嵐編訂《主客圖》應早於李懷民兄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成書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它不像紀書那樣，祇是輯考張爲所錄詩人的資料，所謂“重訂”其實是新編一部中晚唐詩人主客圖，是十足的創新，與張爲原書幾乎沒什麼關係。它將中晚唐詩人略分爲兩派，一是張籍的“清真雅正”派，一是賈島的“清奇僻苦”派，具體成員也異於張書所錄。因爲李懷民覆案《主客圖》論列的各派詩人，感覺非但與現存作品不合，

①〔清〕單烺：《大崑崙山人稿》（嘉慶三年單可基揭陽官舍刻本）卷4。

②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高密三李友朋書劄》，引文及繫年均據包雲志：“劉墉、周永年、吳大澂、葉昌熾未刊信劄四通考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2006）。

③ 汪辟疆：“論高密詩派”，《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61頁。

④ 蔣寅：“袁枚詩學的核心觀念與批評實踐”，《文學遺產》4（2013）。

⑤〔唐〕朱慶餘：“《早梅》詩評”，《瀛奎律髓》（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443頁。

⑥〔明〕楊慎：“升庵詩話·晚唐兩詩派”，《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中冊，第851頁。

⑦〔清〕李文藻：《南澗文集》（功順堂叢書本）卷上。

即與詩家通說也有很大的出入：

余嘗讀其詩，皆不類，所立名號亦半強攝。即如元、白、張、劉，當時統謂元和體，爲乃獨以元稹屬白居易，而張籍、劉禹錫更分承之李益、武元衡，誠不知其何所見。以韋應物之沖淡，獨步三唐，宋人論者惟柳宗元稍可並稱，而乃僅入孟雲卿之室，且與李賀、杜牧比肩，何其不倫耶？其他不可勝舉。至其所標目，適如司空表聖《二十四品》，但彼特明體之不同，非謂人專一體，且即六者亦不能盡其體矣。是蓋出奇以新耳目，未爲定論也。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稱量其體格，竊得兩派焉：一派張水部，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出入風雅；一派賈長江，力求險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振興頑懦。^①

李懷民坦言兩派之說本自楊升庵，但所列王建、張籍、賈島、姚合以下三十二人，別爲清真雅正與清真僻苦二派，則純然出於他的識斷。其書仍沿張爲原式，以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五等列爲二圖，前冠以主客圖人物表，各以年代繫之，注明科第；後附各家詩選，繫以小傳，附錄詩集序跋、評論資料，體例相當完善。據《圖說》自述，選詩限於五言近體，而孟郊無近體，韓愈獨能古體，故皆不錄；所列人物“但因其體格之相近者次爲先後，並時代亦不拘”。我們覆案他所列的詩人，家數都有淵源可考，較之張爲舊圖明顯更具有說服力；評論也很細緻，從字句修辭、篇章結構到藝術成就、體派關係都有值得聽取的見解^②，就內容而言稱得上是梳理中晚唐詩史流變的初步嘗試。但李懷民本人的旨趣卻並不在此，他的目標是通過中唐詩史的重構，重新詮釋和建構唐詩的傳統，在詩壇樹立新的詩歌典範，爲後學指示一條不同於以往的師法路徑。

爲此，他在編訂《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後不久，又編了一部《晉唐六家五言詩選》，選錄晉陶潛、唐韋應物、王維、孟浩然、儲光羲、柳宗元六家五言古詩計185首，其中陶、韋兩家入選篇目多於另四家數倍。前列“本傳節錄”及“諸家評語”，中間小字評語，多取李攀龍《唐詩選》和鍾惺、譚元春《古唐詩歸》之說，以按語表達自己的意見，見解傾向於竟陵。今傳乾隆五十五年（1790）袁詡文精抄本一冊^③，後有乾隆四十三年（1778）底“三李”與門生輩燈下同觀的題識，列名者爲敦測、張清樞、宋默、宋繩祖、任集、王簡、王堪、王箴、敦治九人。由袁詡文“跋”可知，劉大觀也曾謄錄李懷民批語與圈點，然則此書也是李懷民兄弟指點後學的教材之一，不妨視爲《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五言古詩版。不過此書未曾刊佈，他們關於五言古詩的取舍也就不爲世人所知。

非僅如此，儘管李懷民已聲明，《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選詩祇錄五律不及七言，是要力矯當世“匝街遍市無非七律填滿”之弊^④，可它在同儕眼中仍像是一部未完之書。因此，後來當李秉禮勸李憲喬續編七言時，憲喬也坦承：

蓋此乃吾兄石桐先生之志也。先生既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每謂喬曰：“張爲本例不止近體，此不過爲後學所先務耳，余亦當以次例附。即如七古，在鮑明遠輩已濫觴，至於初唐而大行。然學四傑者，或靡曼而失歸。斷以杜爲孔，以韓爲孟，而宋之歐、梅、蘇、石、黃、鄭，南宋之放翁、石湖，金之元遺山以下，皆一脈傳也。予於數家皆篤好之，盍亦以次定爲入室、升堂，爲七古主客圖，吾更參酌焉。”喬應命唯唯，後因全宋詩未得盡見，恐有遺漏，又塵勞多故，因循未就，而吾兄已見棄矣，每用慘切於心。韋廬忽命及此，敢不勉承此舉，會待少暇，且即所見，選爲一帙，請韋廬訂正之，以續石桐之志云。若五古則石桐先有選本，乃以陶爲主，王、儲、韋、孟、柳五家附之者也。此亦即韋廬所宗。然未定五古之主客圖者，以止專清正一派而未列雄奇，故必併入杜、李、高、岑、退之以下，乃爲備耳。^⑤

① [清]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咸豐四年趙子繩刊本）卷首。

② 有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批評價值，李建昆《試論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一文已有細緻剖析，可參看。

③ 劉乾：“高密詩派抄本《晉唐六家五言詩選》”，《文物》10（1981）。湖北省圖書館藏有李懷民《六家詩選》一冊，應即此書。

④ [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主客圖詩論》，《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40頁。

⑤ [清]李憲喬《與李秉禮論詩劄》冊頁，浙江浙商拍賣有限公司2011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57109-285542246.shtml>。

後憲喬猝歿於官，未及從事七古的續編。祇有懷民門人王寧焯繼承老師遺志，編了《中晚唐詩主客圖》七律二冊^①，好像也沒留傳下來。但這不影響《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在鄉里流傳，並逐漸風行於世。袁潔《蠡莊詩話》提到：“山左李石桐輯《中晚唐詩主客圖》，分張水部、賈浪仙為兩派，登萊一帶言詩者多宗之，謂之高密派。”^②張維屏《雪樵續集序》也說：“山左故多詩人，新城王文簡公標舉神韻，為海內宗工。同時益都趙秋谷以思力清劄，起而相角。越數十年而高密李石桐、少鶴昆季岸然自異，別闢町畦，依張為《主客圖》例，尊張水部、賈浪仙為主，以清真、僻苦為宗，一時學之者號為高密體。”^③這出於時代相近的人所記，應該是可信的。儘管也有人認為“其派未甚行”^④，但至遲到嘉、道之間，高密詩派作為地域性的詩歌流派已為詩壇一致承認，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知道，像這樣在當代即得到認可的詩派，清朝並不多見。即便是沈德潛和翁方綱，在本朝也沒有被冠以格調派或肌理派之名。高密詩派確實是個異數，他們的詩學觀念顯然順應了當時的詩學潮流，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要求。

關於高密詩派的藝術取向，汪辟疆曾提出一個被學界廣泛接受的解釋：“先是，清初詩學，以虞山漁洋為主盟，天下承風，百年未替。然末流之弊，宗虞山者，則入於鉅釘膚廓；宗漁洋者，則流於婉弱空洞。李懷民生於乾隆國勢隆盛之時，親見舉世皆阿諛取容，庸音日廣，慨然有憂之。乃與少鶴精研中晚唐人格律，而救以寒瘦清真，一洗百年以來藻績甜熟之習，雖當時排斥者實繁有徒，然數十年中清才拔俗之士，多有聞而信之者。”^⑤自清初以來，詩家厭棄明人的“假盛唐”，取法多轉求他途。既有錢謙益之提倡宋元、二馮兄弟之崇尚西昆，也有李因篤之上溯漢魏，更有王漁洋倡言神韻，希望以深度的師古再現唐賢三昧。然而這些路徑或文或野，或高不可攀，或虛不可捫，最終在後學看來都不是康莊坦途。於是到乾隆初年，學者開始追趨中晚。如桐城方氏兄弟取法中唐，沈德潛門人喬億（1702—1788）評選《大曆詩略》，都已透露先聲。李懷民兄弟的《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更是這股詩學思潮的一個標誌性作品。中晚唐詩的境界、格調雖然一向殊無優評，但相比之下平實易行，所以李懷民《圖說》坦率承認：

盛唐實不易學，前輩謂學《選》體者讀初唐，學盛唐者看中晚，學唐人者讀宋詩。蓋以初唐之與六朝，永貞、元和之與開、寶，北宋之與五代，時相近，人相接，其心法相授，屢降而不離其本。特氣運遞遷，高者漸低，深者或淺，幽隱者或顯露，渾淪者乃說破矣。後學徒厭其淺卑顯露，而務為高深渾淪，是未下學而驟欲上達也。吾謂卑淺者，實與人以可近；顯露者，正與人以可尋。升其堂，不患不入室。（中略）學詩者誠莫如中晚，中晚人得盛唐之精髓，無宋人之流弊，又恐晚唐風趨日下，而取晚之近於中者，類為一家言。雖稱兩派，其實一家耳。學者潛心究覽，久自入於初盛，譬由門戶而造堂奧也。^⑥

聯繫李懷民批嚴羽《滄浪詩話》，說“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一語“誣（疑應作誤）盡有明三百年詩學”^⑦，人們不難洞見其改易師法路徑的實質所在。王寧焯自述其學詩經歷同樣也可以相印證：

每得一家詩，與兩弟戲效其體，輒逼肖，然自以為非是。自《離騷》以下迄國朝人所著錄，無不究覽。後讀張籍、王建五言律詩，曰此可學而至也，盡棄舊作，篇章字句向背離合之故，皆取則焉。以其法證他家，無不合，乃大喜自負。^⑧

所謂“未下學而驟欲上達”，也可以說是對明代以來師古無功的清醒反思，與桐城派登高自卑的

① 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藝文志》（臺北：華文書局，1969）第7冊，第4331頁。

② [清]袁潔：《蠡莊詩話》（嘉慶二十五年刊本）卷9。

③ [清]鹿林松：《雪樵續集》（道光刊本）卷首。

④ [清]邊浴禮：“序”，《對岳樓詩續錄》（咸豐刊本）。按：“序”作於道光三十年（1850）。

⑤ 汪辟疆《論高密詩派》，《汪辟疆文集》，第262頁。

⑥ [清]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咸豐四年趙子繩刊本）卷首。

⑦ [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50頁。

⑧ [清]王寧焯：“皇清文學李君墓誌銘”，《高密李氏家譜》（同治十年石印本）卷四。

師法宗旨同出一轍，兩者不約而同地都將目光投向了中唐。同樣的師法取向也見於性靈派，祇不過他們取法的是白居易一路而已。看清這一詩學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李氏此書一出，不僅鄉人誦習蔚為風氣，就是在周邊地區乃至整個北方也產生了不小的反響。

三、高密詩學由北向南的傳播

隨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廣泛流傳，“高密三李”的名聲流播更廣，與詩壇名公的交遊也愈加密切。李憲喬在《選孟東野詩評》中記載：“近有一朝士某，最好石桐、子喬五言詩，因叩僕所宗主，授以張、賈主客圖。某攜入直廬，讀之三日，既出，乃曰：‘吾觀兩君所取唐人五律殊平平，不如兩君之自作也。’”^①看來“三李”之詩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影響也曾波及京師。雖然這位朝士難以指實，但李氏兄弟的詩名達於京城，很可能與秦瀛有關。李憲喬曾與秦瀛同應乾隆三十九年（1774）順天鄉試，從此交好。乾隆四十二年（1777）秦瀛有《題李少鶴詩冊》，同年秋冬間又有《題李石桐詩集》^②，集中與憲喬唱和之作頗多。秦瀛是乾、嘉之際聲名卓著的詩人，他與懷民昆季的交誼當有助於高密詩學在京師的傳播。

到乾隆後期，高密詩派又傳播於嶺南一帶，這得益於李憲喬宦遊粵西。憲喬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官廣西岑溪知縣，直到嘉慶二年（1797）卒於歸順州知州任，十多年間一直與李秉禮、劉大觀、汪為霖等流寓、游宦詩人交遊唱和，切磋詩藝，遂將高密派詩學傳播於嶺海。他沒有忘卻亡兄的遺志，也沒有放棄早年以詩道為己任的夙志，在以《偶評四名家詩》就李秉禮商訂時，附割末云：“吾志本為辨詩起見，詩道明可以已矣。若欲以此播之於眾，為雌黃前輩之短，以爭其死後之名，某必不肯為也。”話雖這麼說，但他痛批四家以闡明詩道，終究還是希望得到理解和回應的，祇不過他很清楚，憑自己的才力聲望，即便登高而呼，也絕不足以聳動天下耳目。於是此志耿耿於懷，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秋袁枚來遊粵西，他奉巡撫之命接待，這纔感到機會終於出現，“急乞官假錄舊作”^③，請袁枚批正。

袁枚既感念憲喬接應之勤，又賞識其詩才，別後兩度馳書致意，並以一首十二韻的七古酬答這位後輩詩人的索和之作，其中稱讚憲喬的詩才：“裁駭杜陵闖入座，旋驚退之笑窺牖。健門員儼兵五千，富奪東阿才八斗。筆所到處鐵可洞，彩欲飛時霞滿口。歐冶劍鑄吳鉤雙，項籍力扛周鼎九。”^④又將兩人相識的經過和李憲喬的詩作載入《隨園詩話》。以袁枚當時在詩壇的影響，他與李憲喬往來唱和即刻就在當地產生了反響。“袁公既以詩取子喬，桂林人望若登仙，遂益重子喬。”^⑤李秉禮也從此常以詩請益。乾隆五十年（1785），李憲喬赴省，懷民隨行拜訪李秉禮。秉禮連舉文宴，集諸友賦詠唱和，“坐客喧喧，推尊石桐先生為掌教佛祖”。^⑥幾年後，李憲喬又在家書中提到自己在省城“以詩名傾動上官”和“自袁子才烘動以後，桂林輒尚詩詠”的盛況^⑦。袁枚的轟動效應所煽起的，除了好尚詩詠的風氣外，顯然還有李憲喬的名聲。隨着不斷的魚雁往來，互贈著述，李憲喬與袁枚成為稔熟的詩友。《小倉山房詩集》刊行時，李憲喬的題辭與蔣士銓、趙翼兩家並列於卷首，足見袁枚對李憲喬不是一般的看重。山東人對李憲喬與袁枚的這段詩學淵源頗為重視，約成書於乾隆末年的諸城王景琪《牧坡詩話》曾載其事，稱李憲喬“詩學宋人，最喜梅聖俞、陳後山，以其自抒性情，不事浮靡也。袁隨園激賞之，題其集‘古人復作’，與之唱和”^⑧。這段詩緣在詩壇產生的廣泛影響，對高密派詩家來說無疑是一個莫大的鼓勵。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月，已丁憂去職的劉大觀，能夠施施然袖詩謁袁枚於隨園，想

① 原列於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中，《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113頁。據內容考之，當為李憲喬作。

②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集》（道光間世思堂刊本）卷5。

③④ [清]袁枚：“岑溪令李君義堂猥蒙佳贈兼索和章舟中卻寄”，《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第1冊，第714頁。

⑤⑥ [清]李懷民：“紫荊書屋詩話·北歸日記摘錄”，《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89、90頁。

⑦ [清]李憲喬：“桂林家書摘錄”李懷民注，《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168頁。

⑧ [清]王景琪《牧坡詩話》（濟南：山東大學圖書館藏烏絲欄清鈔本）卷3。關於此書成書年月，參看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423頁。

來與袁、李這段詩緣有關。^①

當時正值《隨園詩話》刊刻行世，書中不僅有幾則論及李憲喬的詩歌，還記載了其兄弟編纂《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情況：

李懷民與弟憲喬選《唐人主客圖》，以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為主，餘人為客，遂號所詠為《二客吟》。懷民《贈人盆桂》云：“送花如嫁女，相看出門時。手為拂朝露，心愁搖遠枝。”《送張明府》云：“在縣常無事，還家祇有身。隨行一舟月，出送滿城人。”憲喬詠《鶴》云：“縱教就平立，總有欲高心。”“不辭臨水久，祇覺近人難。”《曆下廳》云：“馬餐侵皂雪，吏掃過階風。”《送流人》云：“再逢歸夢是，數語此生分。”二人果有賈、張風味。^②

這裏由《詩人主客圖》的編纂宗旨論及李氏兄弟自己的創作，認為他們的詩歌體現了創作與批評的一致。以袁枚在當時擁有那種噓枯吹生、點石成金的魔力，他的一番品題必然會左右詩壇的輿論，使高密李氏兄弟聲價騰越。王寧燦撰李懷民墓誌，曾嘆惜“先生終老於諸生，而名不出於里巷”^③。但有了《隨園詩話》的表彰，這麼說就顯得不太符合事實了。李憲喬的上司、同時也是高密詩派的追隨者鎮安知府汪為霖，寄憲喬詩即稱：“《隨園詩話》分明在，麟鳳山東得幾人？”^④《隨園詩話》的褒揚，起碼已使李憲喬兄弟被視為山東詩家的代表人物。這對於提升“高密三李”的知名度，推動高密詩派在南方的傳播無疑是有重要作用的。

四、高密詩學在乾隆以後的傳播

李氏昆季從一開始就憋着股勁，雄心勃勃地向詩壇各派全面發起挑戰，在八面受敵的同時也吸引了詩壇的目光。乾隆五十九年（1794），李憲喬有長割致袁枚，“憂近今詩教有以‘溫柔敦厚’四字訓人者，遂致流為卑靡庸瑣”，希望袁枚起而共挽之。^⑤袁枚也報以長割，對他持論的固執給予委婉的訓誡。無論他的見解能否為李憲喬接受，這通書割作為袁枚晚年最鄭重的論詩文字收入《小倉山房尺牘》中，都會是很引人注目的。李憲喬對當下詩壇的批評及其勇於擔當的氣概，更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畢竟不是誰都有這種以詩道為己任的抱負，袁枚對李憲喬的重視多半也緣於此。更何況，李憲喬絕不是個好作空言的人，向來都將自己的主張付之踐行。在粵西任職期間，他以詩接引後進，培養風雅為己任，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知柳城縣，屢招集馬平詩人和門生吟詠唱和，舉仙弈詩社。《歸順直隸州志》卷五載：“（憲喬）乾隆六十年升任知州，明敏剛斷，禮士愛民。尤工於詩，政暇嘗以教州人士，州人粗知韻語，皆憲齊所教也。貢生童毓靈、庠生童葆元，皆經其陶育，一時風雅稱彬彬焉。”^⑥郭嵩燾日記曾載，柳州王拯（亦字少鶴）論詩最推高密李憲喬，“謂其以專壹憔悴為詩，粵人言詩者皆師法之”。^⑦李憲喬對粵西詩歌創作的倡導之功，確實是眾所公認、有口皆碑的，他的詩學著述也為當地學人所寶重。他曾為李秉禮考定韓愈集，順便將韓詩批點一過，^⑧中山大學圖書館所存李秉禮舊藏本《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過錄有李憲喬批、王拯題識及相關信息告訴人們，李憲喬的批點至少有七個傳錄本^⑨，足見其為人所重及流傳之廣。

① [清]袁枚《隨園詩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補遺卷3載：“辛亥端陽後二日，廣西劉明府大觀袖詩來見。方知官桂林十餘年，與比部李松圃、岑溪令李少鶴諸詩人，皆至好也。”

② [清]袁枚《隨園詩話》卷10。

③ [清]王甯燦：“皇清文學李君墓誌銘”，《高密李氏家譜》卷4。

④ [清]汪為霖：“得江舟中寄柳城李少鶴明府”其一，《小山泉閣詩存》（道光二十年如皋汪氏文園重刊本）。

⑤ [清]袁枚：“答李少鶴書”，《袁枚全集》，第5冊，第169—170頁。又見[清]李憲喬：“與袁子才論詩教”，《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177—179頁。

⑥ [清]顏嗣徽纂：《歸順直隸州志》（光緒二十五年刊本）。

⑦ 《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卷，咸豐八年（1858）十月十一日。

⑧ 郭尚傑在《〈韓詩臆說〉的真正作者為李憲喬》文中提到，陳邇冬舊藏《韓昌黎詩集箋注》李憲喬批校本，末卷封底有憲喬《為正孚考定韓集書後兼呈敬之郎中錫蕃秀才》詩二首。

⑨ 李福標“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李憲喬批校在粵地的流傳，《文獻》2（2012）。

李憲喬在粵西的詩學活動，對當地的詩歌創作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他身後仍通過昔日詩友持續發揮作用。嘉慶二年（1797），李憲喬客死於官，宦囊蕭索，不能歸葬，李秉禮以千金送其喪。後其《韋廬集》付梓時，凡經李憲喬評點的篇什編為內集，憲喬歿後所作未經點定者則編為外集。道光四年（1824），周作楫視學廣西，謁李秉禮時，仍出《韋廬集》相示，“極言詩學得力於山左李少鶴昆仲”。^①內集李憲喬的評語對於瞭解高密詩派的詩學觀念有着重要的文獻價值。劉大觀則倡議刊刻《二李詩鈔》，又在嘉慶十年（1805）刊行《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以寄託對亡友的感懷；嘉慶十九年（1814），趙擢彤重刻《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劉大觀又為撰序。他還收徒講學，授以高密詩法，對高密派詩學宗旨的傳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王芑孫有《答劉松嵐觀察大觀枉贈即送入都》詩云：“君鄉高密李（謂少鶴），近效亦豈誣？溫文轉廉辨，彌縫變拘迂。成勞雖未酬，遺蔭恤其雛。君故學其詩，治行當可模。”^②在惋惜李憲喬的同時稱讚了劉大觀的詩才和治行。

據王芑孫《題李石桐少鶴昆季送家直庵鄉舉詩冊》云：“予以乾隆戊申三月召試賜舉人，高密家直庵，亦以是年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為考功主事。又四年，出其鄉舉時諸同學贈詩，並李君石桐所為畫、少鶴所為文示予。予觀諸君子之贈直庵也，類所相勉以義。高密海東一隅地，比者石桐、少鶴以古學倡其間，其鄉之士從而和之。二李既以學行有聞，直庵又連得科第，卷中諸君雖未即赫然暴著，而一二姓名稍稍流聞遠近。”^③此文作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據此可知，到乾隆末年，李氏兄弟在詩壇已享有一定聲譽，並播散了高密詩派的名聲。李懷民的五言詩尤為詩家所推重，乾隆五十九年（1794）張問陶《冬夜讀李懷民五言律詩》稱“此境殊難得，高懷自古今”^④。嘉慶初，又經“一時有龍門之目”的法式善表彰，高密詩人遂成為間引人矚目的詩派。法式善《梧門詩話》卷九論高密詩人的一則，是歷來對高密詩派最詳細的評論，其中提到：“山左近日有專工五言者，王考功寧焯、劉大令大觀為最。二人又盛推其鄉人李石桐、子喬昆季為最。（中略）石桐學右丞，其旨微；子喬學閻仙，其體潔，各臻妙境，宜考功、明府低首也。”^⑤

嘉慶以後，隨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流行於世，高密詩派的影響也蔓延開來。在粵西一帶，除了汪辟疆提到的李秉禮、朱依真、孫顧崖、趙延鼎、劉大觀及弟子輩的唐昌齡、袁思名、葉時哲、童毓靈、介支、葆元兄弟外，以汪為霖為代表的一批游宦詩人也受到高密詩風的熏陶。汪為霖（1762—1822），字傳三，號春田，江蘇如皋人，知廣西思恩府，以廉靜稱。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調任鎮安知府，嘉慶元年（1796）又輔佐督帥襄理軍務。在鎮安期間，與李憲喬、劉大觀及李秉禮等遊從酬唱，詩風由清婉淡蕩一變而為清健峭麗^⑥。其《小山泉閣詩存》八卷，存詩近千首，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五曾稱道其篇什。其《友人有所謂隨園主人詩似香山而余詩復似先生為吟一律示友並質之先生》詩有“先生宗白我推袁，萬古心香共此源”之句，頗以詩才高自期許。鎮安夙為粵西重鎮，名詩人商盤、趙翼曾蒞任知府。汪為霖自言：“吾縱不能頡頏二君，而振文教、育人才，尤邊徼之急務也。”^⑦在任期間，熱心指授當地士子詩藝，造就人才甚眾，都有詩集行世。

到嘉、道之際，李秉禮子宗瀚，能“守其家法，並及高密二李緒論”^⑧。又有紹興人楊繼榮，嘗與李秉禮、李憲喬往來倡和。二李歿後，與汪運、商書浚、曾克敬、朱琦、龍啟瑞、彭昱

① [清]周作楫《雪樵續集序》，《雪樵續集》（道光刊本）卷首。

②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編年詩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480冊，第570頁。

③ [清]王芑孫《揚甫未定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481冊，第257頁。

④ [清]張問陶《船山詩草》（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293頁。

⑤ [清]張寅彭、強迪藝《梧門詩話合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第274—275頁。

⑥ 關於汪為霖仕桂期間與李憲喬的交遊及詩風所受的影響，可參閱戎霞、梁揚：“論汪為霖與廣西高密詩派的關係”，《閱讀與寫作》10（2011）。

⑦ [清]羊復禮纂：《鎮安府志》（光緒十八年刊本）卷22。

⑧ 汪辟疆：“論高密詩派”，《汪辟疆文集》，第263頁。

堯、李宗瀛、趙德湘、黃錫祖十人，常於桂林櫛湖（今名杉湖）補杉樓飲酒賦詩，時稱“櫛湖十子”，同治七年（1868）廣西巡撫張凱嵩刻有《櫛湖十子詩鈔》，被視為高密詩派在廣西的流裔。至於其他地區，李憲喬曾說：“一向在桂省，以詩來求政者甚衆。一戴舍人，湖北人；一胡進士，江西人；一關孝廉，臨桂人。其餘零星未成家數者，不勝紀也。”^①汪辟疆曾指出：“胡森亦以江西人，與少鶴往來，自是江西詩人多有傳其《中晚唐詩主客圖》者，於是江西有高密之派。孫顧崖以吳人官粵西，而最服膺石桐少鶴詩說，以為今日詩道之存，實賴二李。則顧崖固能為二李之詩者，於是東吳有高密之派。逮於清季，臨川李梅庵瑞清，僑居金陵，嘗稱其家學，曾舉其家藏鈔本《中晚唐詩主客圖》，授和州胡俊。而胡氏《自怡齋詩》亦遠宗張賈，近法石桐，（中略）然則高密二李之詩派垂二百年猶未絕也。”^②其中最應該提到的是劉大觀的影響。自“高密三李”下世後，劉大觀就自然地成了高密詩派的旗手。他後來宦益達，才名益盛，有《玉磬山房集》行世，翁方綱題其詩，稱“仲則云亡蘭雪病，君才二子欲兼之”^③。他不僅校刊李懷民、憲喬兄弟的詩集《二客吟》，重刻《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更在歷任開原縣、寧遠州、河東兵備道、山西布政使的遊宦生涯中，將高密詩學傳播於遼東、江浙、三晉地區，可以說是將高密詩學發揚光大的最大功臣。

最遲至道光間，高密詩派作為地域性的詩歌流派已為詩壇所矚目。儘管也有人說“其派未甚行”^④，但張維屏為高密派詩人鹿林松所作《雪樵續集序》，足以說明高密詩派是當時公認的詩歌流派：“山左故多詩人，新城王文簡公標舉神韻，為海內宗工，同時益都趙秋穀以思力清剴起而相角，越數十年而高密李石桐少鶴昆季岸然自異，別闢町畦，依張為《主客圖》例，尊張水部、賈閔仙為主，以清真僻苦為宗，一時學之者號為高密體。”^⑤而此時高密詩派的影響早已不限於山東和江西、吳中，而是隨着詩人的流動播散到整個北方地區，甚至遠屆關外。當時有“關外一人”之目的鐵嶺詩人魏燮均，後人認為他“詩學孟東野”^⑥，其實是學的《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高密詩人王相庸撰《九梅村詩集序》載：“戊戌冬（按：道光十八年，1838），余歸觀山左，子亨錄所為詩數卷，乞攜歸就正於余先君。先君披覽樂之，既喜斯道越海有傳人，又喜庸之能擇交良友也，慨然允為弁言，以資宏獎。且欲加點墨評識於其上，命筆未竟而先君遽以疾逝。”後鄉里先輩李魯欽、李子亮、王亦園、李希夷等聞之，索讀校訂，並為題詞，逾年寄魏燮均。三年後，王相庸再遊遼東，以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相示，燮均讀之有所得，為詩吟益苦。及咸豐元年（1851）王再至遼東，則魏燮均已徹底脫胎換骨。“其所以發而為詩，不必規規焉模唐，不必沾沾焉不模唐，而自出入儲張賈孟之間矣。”今《九梅村詩集》附錄題詩，有高密王昶、王佩韋、王相庸、王焯、李璜之作，悉為當時所題，這是高密詩派遠傳關外的一個有趣例證。由於高密詩派的廣泛傳播，屬於高密派詩學文獻也相當流行。後來董文渙之所以增訂《高密李氏評選孟詩》，於同治七年（1868）刊刻行世，想來是大有市場需求的。從乾隆中葉直到清末，高密詩派承傳百餘年並在較廣大的地域產生影響，這在清代文學史上祇有桐城派可以相提並論，對其詩學理論與創作的研究還有待於深入展開。

〔編者註：該文為作者承擔的中國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清代文人事蹟編年匯考”（13&ZD117）、中國社科基金項目“乾隆朝詩學的歷史展開研究”（12BZW051）的階段性成果。〕

① [清]李憲喬：“擬寒閣詩話”，《山東文獻集成》第3輯，第47冊，第263—264頁。

② 汪辟疆：“論高密詩派”，《汪辟疆文集》，第263頁。

③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題劉松嵐詩卷二首”其一，《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刊本）。

④ [清]邊浴禮：“序”，《對岳樓詩續錄》（咸豐刊本）。

⑤ [清]鹿林松：《雪樵續集》（道光刊本）卷首。

⑥ [清]陳德懿：“序”，《九梅村詩集校注》（沈陽：遼海出版社，2004）下冊，第925頁。